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第四版)

ZHONGGUO CHUANTONG WENHUA GAILUN

主编 辜堪生 副主编 潘斌 张奇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如是者，虽深，其人不加虑焉；虽大，不加能焉；虽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谓不与天争职。

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所，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第四版)

ZHONGGUO CHUANTONG WENHUA GAILUN

主编 辜堪生 副主编 潘斌 张奇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辜堪生主编. —4版. —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8.7

ISBN 978-7-5504-3360-1

I. ①中… II. ①辜… III. ①中华文化—概论 IV. ①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04001号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第四版)

主 编:辜堪生

副主编:潘 斌 张 奇

责任编辑:刘佳庆

责任校对:王青清

封面设计:穆志坚 张姗姗

责任印制:朱曼丽

出版发行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四川省成都市光华村街55号)
网 址	http://www.bookcj.com
电子邮件	bookcj@foxmail.com
邮政编码	610074
电 话	028-87353785 87352368
照 排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16.5
字 数	295千字
版 次	2018年7月第4版
印 次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3000册
书 号	ISBN 978-7-5504-3360-1
定 价	38.00元

1.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2. 如有印刷、装订等差错,可向本社营销部调换。
3. 本书封底无本社数码防伪标识,不得销售。

目 录

1	1 导论
2	1.1 概说“文化”和“文明”
4	1.2 何谓“文化”
10	1.3 中国传统文化
14	1.4 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简要历程
16	2 中国传统文化生存发展的自然地理环境
16	2.1 人类文化与自然地理环境之关系
17	2.2 人类文化产生、形成及发展变化的地理环境因素
20	2.3 中国传统文化的地理环境因素及其文化特征
24	2.4 农耕地理环境支配下的中国“天下中心”观
28	2.5 古代农耕地区与游牧地区的文化差异与文化融合
38	3 弘扬主体精神的儒家
38	3.1 周文化与儒家文化的缘起
44	3.2 孔子、孟子与儒家文化的产生
57	3.3 宋明理学与儒家文化的发展

目 录

73	4 崇尚自然无为的道家
73	4.1 老子：道家文化的创始人
83	4.2 庄子：道家文化的继承者与传播者
90	4.3 黄老之学：道家文化的新形态
93	4.4 魏晋玄学与儒道合流
100	4.5 道教产生与特点
105	5 主张超尘脱俗的佛家
105	5.1 佛教的产生、传播及三藏佛典的形成
109	5.2 佛教的基本教义
114	5.3 佛教的宇宙哲学观
116	5.4 佛教传入中国及其演变与发展
122	5.5 佛教与中国古代社会政治
128	5.6 禅宗——中国化佛教的典型
132	5.7 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大影响
135	5.8 中国佛教四大菩萨与四大名山
138	6 宣扬兼爱的墨家与强调功利的法家
138	6.1 宣扬兼爱的墨家
145	6.2 强调功利的法家
158	7 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格追求
158	7.1 追求“修齐治平”的儒家“君子人格”

目 录

163	7.2 追求“清静无为”的道家“隐士人格”
168	7.3 追求“建功立业”的法家“英雄人格”
174	7.4 追求“超尘绝俗”的佛家“随缘人格”
180	8 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
180	8.1 人生价值观
183	8.2 自然价值观
187	8.3 道德价值观
191	8.4 经济价值观
196	8.5 审美价值观
201	9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
201	9.1 兼容并包性
204	9.2 非宗教性
209	9.3 泛道德性
217	9.4 内倾性
220	9.5 乡土性
227	10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227	10.1 天人合一
231	10.2 自强不息
235	10.3 贵和持中
238	10.4 平均平等
240	10.5 人本主义
245	10.6 忧患意识

目 录

248	10.7 达观自信
251	10.8 求是务实
254	参考文献
257	后 记

1 导论

在绵亘数千年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贯穿着一种非同凡响的精神：在我国广袤的领土上，无论何人，在其身上都显示出一种共同的、与社会生活相融合且互相影响的文化精神。这共同的文化精神形成了我们优良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行为出自下列七种因素之一：机会、本性、强制、习惯、理性、希望和热情。其实，人之所以做出某一行为，主要是因为依从其“文化指令”的指引，而“文化指令”主要是人在后天的培养、环境的熏陶下锤炼积累而来的。

今天，我们学习和研究优秀的传统文化，有助于我们更加准确地、深刻地认识已有的优秀文化，认识我们的民族。正如古希腊人在阿波罗神庙前镌刻的至理名言：“人啊！认识你自己。”不管是个人还是社会，也不管是对于科学还是学说，自我反省都是必需的。通过反省，可以总结经验和教训，解放思想、获得新的发展。改革开放给各民族开辟了相互交流、不断拓展的广阔道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华民族文化应以怎样的姿态同其他民族文化进行合作与交流，我们应以怎样的姿态把握自己、表现自己，是每一个炎黄子孙都应该思考的问题。真切地把握住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较之把握其皮毛等表层问题要困难得多。不过，由于民族不同，致使反映其民族精神的传统文化也各有差异。我们之所以能从普通人的行为、习惯中辨识各民族的特征，是因为每个民族的民族精神都有其独特的一面。学习、研究中国文化，正是我们认识自己、把握中华民族精神、培养和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使我们具有合理的“文化指令”的可靠途径，对我们有诸多裨益。

首先，研究和學習中国传统文化，能够使我们更加准确、深刻地认识我们当前的国情。文化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它必然也有相当长的历史。文化是一个传统，要理解文化也就必须理解什么是传统，二者难以分离。任何有价值和影响的文化传统，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文字的记载，即依赖于文字的载体，这些载体多数成为后世的经典，要认识、了解文化传统，就不能不认真研读传统的经典及其阐释。新一代的青年学子们既要担负起历

史使命，又要顺应历史的发展，要顺应主流的意识形态，就必须清醒地认识和把握国情。国情并非空洞之物，其实质就是文化的历史及其现状。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走过了曲折的道路，也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是，我们的社会发展程度还不尽如人意。虽有数千年的文化遗产，但也带来一定的重负。外来文化有积极的一面，接受尚且不足，其负面影响又在不断扩大。所有这一切不得不让我们深深地思考，不得不使我们由衷地忧虑。认真总结过去的经验和教训，深刻剖析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影响，对我们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认清国情是十分必要的。

其次，研究和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有助于端正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增强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创造我们美好的未来。任何一种文化，自有其发生、发展的历史，它总是在前代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代炎黄子孙，理应以理性的态度和求真务实的精神去继承传统。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择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他们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的条件下创造的。”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我们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是影响中国人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传统文化。传统是社会的一种生存机制和创造机制，有了它社会才得以延续、传承、飞跃，社会精神成就和物质成就才得以保存和发展。今天，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研究不能仅停留于博物馆和故纸堆，还应深入到实践中，继承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培育我们的理性态度和务实精神。

1.1 概说“文化”和“文明”

“文化”一词并非古已有之。无论是古希腊文字，还是中国的甲骨文中都找不到它的痕迹。虽然文字中无，但并不等于它就不存在，只不过是人类在那时尚不自觉、尚不认识。要认识它、研究它也有几百年的历史，这期间也曾有过几次大论战，但至今尚无统一意见、统一定义。

在汉语工具书中，“文”和“化”是两个不同的词类。前者为名词，而后者为动词。“文”是一个原创个体字，在汉代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中解释为“错画也”。《周易》里说：“物相杂，故曰文。”而在其他典籍中又引申为“修饰”（《荀子·儒效》：“取是而文之也。”），“节奏”（《礼记·乐记》：“乐文同则上下和矣。”），“美”“善”（《礼记·乐记》：“礼减进，以进为文。乐盈而反，以反为文。”）。在《周书·谥法》里更是说：“道德博闻曰文，勤学好问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民惠礼曰文，锡民爵位曰文。”除

“六艺”之外，尊卑序列均可“曰文”。

“化”字在《说文解字》中被解释为“教行也”（“教行于上，则化成天下。”）、“变也”（《庄子·逍遥游》：“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吕氏春秋·顺民》：“则汤达乎鬼神之化。”）、“习也”，言指风俗习惯也（《人物志》：“国有俗也”）。归纳起来即是有演进变化之意，从而可以引申出教化、教行、迁善、感染、化育的意义。

“文”与“化”的搭配使用，最早见于《易·贲卦》中的《象传》：“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因天象有“文”（即条理）可循，而人伦也有“文”可循，观察此人文（人间条理），用以教化世人，也即可以平治天下大业。这种“人文化成”的设想，便有别于“神文”倾向的“人文倾向”，也是先哲们对“文化”一词的诠释。

而将“文”与“化”二者合并使用，则始见于西汉末年刘向所著之《说苑·指武》。其中说：“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这里显然将“文”和“武”相对应而有别。《昭明文选》上载有晋束徵所作《补亡诗》：“文化内揖，武功外悠”，显然与之内容相近。而在宗教神性相对应的意义上使用“文化”一词的，则有南齐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总之，两千年来，我们的先人都是将“文化”一词来并称“文治”“教化”的。

现代意义的“文化”一词，是从日本人对西方术语的使用过程中开始的。日本人用“文化”一词来对译英文的“Culture”、德文的“Kultur”，而以上各词均来源于由“Colere”演化派生的拉丁词语“Cultura”。拉丁语中“Cultura”具有“耕种”“培植”“居住”“练习”“留心”“注意”“敬神”等诸多含义。16—17世纪，欧洲在使用“Culture”过程中由“耕种”等义引申出对人类心灵、知识、情操、风尚的化育，从重物质生产转向重精神生产。

与“文化”一词意义相近者如“文明”。“文明”中之“文”实指“文采”“文藻”“文华”，“明”指“开明”“明智”“昌明”“光明”。“文明”一词首见于《尚书·舜典》之“睿智文明”。按孔颖达的说法，则为“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他在疏解《易·乾·文言》时说：“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和万物，故天下文章而光明也。”在中国古典载籍中也有将“文明”看作一种进步状态来与“野蛮”相对，如李渔《闲情偶寄》中就有“辟草昧而致文明”。唐睿宗李丹也曾用“文明”二字作自己的年号。近代还有“文明戏”“文明棍”等说法。

用“文明”对译“Civilization”，始于清末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郭实腊所

编中文期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英文“Civilization”源于“城市”，表示城镇生活的秩序和原则，是与“野蛮”和“不开化”相对的概念。

“文化”与“文明”两词常常混用，如清末的“西洋文明”“西洋文化”；而将两者加以区分，则始于胡适。胡适于1926年在其《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中，将“文明”定义为“一个民族应付他的环境的总成绩”，而将“文化”定义为“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方式”。显然，他认为“文明”是先于“文化”的。张元济先生则提出“文化是活的，文明是结果”，则“文化”先于“文明”。可见，对二者之关系的认识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1.2 何谓“文化”

尽管“文化”在中西方文献中多有记载，但对其深究探讨并给其定义则是晚近的事。有的学者认为，“文化”的科学概念，只是到了18世纪启蒙时代，才真正产生出来。迄今为止，国内外学术界关于“文化”的定义，已不下200种。

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欧洲人率先摆脱了“神本”和“物本”（即以自然为本）的束缚，开始对人的力量抱有绝对的信心，对人的主体性给予了完全肯定的评价。“以人为本”，成为人的自我觉醒和人的解放的根本标志。

无论中西，“文化”从语源和语词内涵的演变上就含有文化是自然的对立物和人类的创造物的意义。这种意义深深植根于物质生产劳动所体现的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之中。古代思想家“制天命而用之”“以人造天”的认识，就是古史传说中的圣王（劳动实践活动中的英雄）总结治理自然、社会经验，并用它来教化百姓，即“以人文化成天下”思想的合逻辑的发展。

《易·贲·象》说：“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指自然秩序，“人文”指人事条理，两者并不矛盾。文化来自自然，又区别于自然。古代圣贤明察自然变化，然后把改造自然的经验总结出来，把人类社会管理的经验也总结出来，创造出礼、乐、典章制度，教化民众，流传后世。

《易·系辞传》中的“观象制器论”表达了古代中国人“以人文化成天下”的文化观。伏羲氏仰观天象，俯察地理，研究鸟兽草木，近则了解人身，远则探讨万物，创造了八卦，并以八卦来贯通宇宙万物的神奇变化，

观察自然、制作工具。依据八卦的原理，伏羲结绳作网，用来打猎捕鱼，神农氏斫木作耜，并教导人民利用这种农具；黄帝、尧、舜改革变通，创制衣服、舟楫，驯养牛马，发明加工粮食的杵臼和作战的弓箭，创造房屋代替洞穴，研制文字代替结绳而治，从此百官利用文字来处理政治，万民利用文字来考察事物，大体说明了先民如何由观察自然到制作工具，改造自然，取得经验，遗传给后代的历史活动过程，表明人类创造文化脱离野蛮的历史状态。文化是人的产物，为人所创造，古人似乎已经懂得了这一道理。尽管古史传说把功劳归功于圣王，但并没有把圣王塑造成脱离民间生活的上帝，而是与人民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滚在一起的英雄。所以，“文化”含有与自然对立、与野蛮脱离的含义，即开化、教化。这一语义的进一步发展，就使文化含有了知识、教养的意义。

总之，文化是人的生存状态，是人的生存环境，包括社会规范、礼乐制度等。人类生活的任何一方面都不能不受到文化的影响并随着文化的变化而变化。这就是说，人造就了文化，文化也决定了人的存在，决定了人的思维、行为、情感方式。人存在的基础条件是种族、语言、地域、性别、宗教，等等。人类存在于天（宗教）、地（自然）、人（社会）、我（自我情感、自我意识）之间，人的存在方式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

在文艺复兴时期孕育了“文化”的科学概念。到了18世纪，在人文传统深厚的德国，出现了著名的哲学家康德、赫尔德和文学家歌德，依据与中世纪迥然不同的关于人的看法，他们对“文化”做出了划时代的界定。

康德1790年在其名著《判断力批判》中认为，文化乃是人作为有理性的实体为了一定的目的而进行的有效创造。“在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里面，产生一种达到任何自行抉择的目的的能力，从而也就是产生一种使一个存在者自由地抉择其目的之能力的就是文化。因之我们关于人类有理由来以之归于自然的最终的目的只能是文化。”^①文化的本质在于，主体（人）不断地获得确立一切目的的能力，即不依赖于自然的行动能力。文化是促进人们更加自由的选择，确立并推动目的实现的力量。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化也就是人的社会价值，是人的力量的显现。康德理性主义的文化观，比较重视文化主体改造自然的的活动及其功能。这种文化定义，显然是针对法国启蒙学者把自然看成文化，把自然简化为人的行为的机械主义的文化观的。康德把道德观念看成人类文化的最高表现。这个看法曾影响了我国学者辜鸿铭和唐君毅等人。辜氏在20世纪初出版的《春秋大义》（又

^①（德）康德：《判断力批判》[M]，韦卓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95。

译作《中国人的精神》(《原华》)中指出:文化不是房子、不是道路、不是器具、不是制度、不是科学、不是艺术,而是人格,文化的实质就是道德。唐君毅在20世纪中期出版的巨著《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中,以“道德自我”或“道德理性”为中心,论述“人类一切文化活动,均统属于道德自我或精神自我,超越自我,而为其分殊表现”,并建立了道德的理想主义的文化哲学体系。

启蒙思想家、文化哲学家赫尔德继承了近代历史哲学奠基人维柯的思想,在巨著《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中,也肯定了人的本身就是目的。尽管他与康德之间有过争论,但二人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人在其理性的和道德的生活中,证明了他自身的存在是正当的。自然创造人的目的就是要创造一种理性的生命,人性作为一种精神力量的体系不断发展着自身。赫尔德探讨了人、社会、文化的关系,认为文化是社会的产物,是人活动的产物,又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们活动的重要手段。文化既促进了人,也限制了人。文化和哲学的中心是人的问题。

赫尔德在“狂飙运动”(18世纪70年代、80年代德国资产阶级的文化运动)中的同志、《浮士德》的作者歌德认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活与思想的集体方式,即人类对自然的长期斗争的结果,此集体的思想、感觉、行为的方式所构成的一种特殊的气氛、特殊的美,即是文化。

一般来说,马克思以前的思想家,把文化局限于精神活动领域,在文化史里排斥物质劳动和社会劳动对于文化发展的意义。不过,从赫尔德和歌德的文化观来看,已经有了一些唯物史观的因素。

英国著名人类学家,被称为“人类学之父”的泰勒1871年在其名著《原始文化》里,对“文化”下了一个经典的定义:“所谓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的意义来说,乃是包含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及任何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① 泰勒的定义明确地剔除了人的本能,即生物学遗传或先天性行为,强调了“文化”是作为社会成员的人获得的,是具有社会性的,超个人的存在,同时说明了“文化”是诸要素的综合体。但是,泰勒的定义仍旧是描述性的,还没有深刻地揭示文化的本质。泰勒的列举是可以无限地添加的,如我们可以把“社会制度”“社会组织”列入;泰勒本人在1881年出版的《人类学》中加进了“技术和物质文化”;后来,美国的人类学家奥格本等修订这一定义时补进了“实物”……可见,对于“文化”的界定,不能停留于外

^① 庄锡昌,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99-100.

在的描述上。

关于“文化”，不少学者从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哲学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界说。例如，美国人类学家克鲁柯亨在《文化的概念》中提出：“文化是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式样的系统，既包含显性式样又包含隐性式样，它具有为整个群体共享的倾向，或是在一定时期中为群体的特定部分所共享。”新康德主义者、弗莱堡学派著名代表李凯尔特在《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里提出了价值论的文化定义，他认为“价值是文化对象所固有的……如果把价值和对象分开，那么文化对象也就会因此而变成纯粹的自然了”“不仅应该从价值的观点，而且应当从对文化现象做出评价的那些具有心理的人的观点去考察文化现象”。^①现代著名文化哲学家卡西尔在其《人论》中提出了符号学的文化定义，认为人是“符号的动物”，文化作为人的符号活动的“产品”成为人的所有物，而人本身作为它自身符号活动的“结果”则成为文化的主人，文化无非是人的外化、对象化，无非是符号的现实化和具体化，符号和符号功能建立起了人之所以为人的主体性。

力主实地考察并身体力行的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提出了功能性的文化定义。他认为，文化是人类生活的手段、工具，生活是文化的主体。他在《文化论》里提出：“文化是包括一套工具及一套风俗——人体的或心灵的习惯，它们都是直接地或间接满足人类的需要。一切文化要素，如果我们的看法是对的，一定都是在活动着，发生作用，而且是有效的。文化要素的动态性指示了人类学的重要工作就是研究文化的功绩。”而美国俄裔人类学家索罗金提出了规范性的文化定义，认为文化是生活方式的整体，包括意识、价值、规范此三者的互动和关联，把文化界定为不同人类群体的生活方式或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强调文化作为人类价值规范的作用。美国现代人类学家格尔兹在其《文化的解释》中指出：“文化是一种通过符号在历史上代代相传的意义模式，它将传承的观念表现于象征形式之中。通过文化的符号体系，人与人得以相互沟通，绵延传续，并发展出对人生的认识及对生命的态度。”不同的学者对于“文化”的定义真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20世纪初，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以后，我国学者围绕着中国文化与西洋文化的碰撞问题，也开始认真研究“文化”的定义和实质。当然，也涉及“文化”的界定。

^①(德)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M]，涂纪亮，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21、25。

胡适认为先有文明，而后才有“文化”。他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中指出：“文明是一个民族应付他的环境的总成绩，文化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方式。”而梁启超在《什么是文化》里说：“文化者，人类心能所能开积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而且，梁启超还列出表格以说明“文化”的内涵，见下表。^①



梁启超在《中国文化史目录》中纳入朝代、种族、政治、法律、教育、交通、国际关系、饮食、服饰、宅居、考工、农事等项。蔡元培在《何谓文化》一文中列举了衣食住行、医疗卫生、政治、经济、道德、教育、科学，指出“文化是人生发展的状况”。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儒”的梁漱溟先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说：“文化并非别的，乃是人类生活的样式。”他认为，文化包含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三大领域。梁氏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认为，文化涵盖了人类各民族如何进行生产，其所有器具、技术及相关社会制度、宗教信仰、道德习惯、教育设施乃至语言、衣食、家庭生活，等等。“全部中国文化是一个整的（至少各部门各方面相联盟）。它为中国人所享用，亦出于中国人之所创造，复转而陶铸了中国人。”^②学者黄文山则受功能派的影响，他在《文化学体系》中提出：“文化

^①易鑫鼎，梁启超文集 [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494、501。

^②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60。

是人类为着满足生活的需要，凭借语言系统、技术发明、社会组织与习惯，累世承袭创建出来的有价值的‘工具实在’。文化只是人生，只是人类的生活……文化是指集体的大群的人类生活而言。”^① 贺麟在《文化的体与用》《文化与人生》中指出：“文化是经过人类的精神陶铸过的自然。”“文化是名词，同时也是动词；化含有改变的意义；文要化，要影响其他的一种东西，要感化或支配别的一种东西；譬如教育、譬如诗歌，可以使人向善，可以使人有优美的情操；这就是文化之一。”“所谓文化乃是人文化，即是人类的精神活动所影响、所支配、所产生的。又可以说是文化即是理性化，就是以理性来支配处理任何事、从理性中产生的，即谓之文化。文化包含三大概念：第一是‘真’、第二是‘善’、第三是‘美’，即是真理化、艺术化、道德化”。“文化的特征乃是征服人类的精神，使人心悦诚服。”当代学者金开诚将“文化”定义为：“文化是对具有一定社会共同性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起引导或制约作用的、由各种集体意识所形成的社会精神力量。”可见，中国学者对“文化”的解释也是人见人殊的。

虽然众说纷纭，但以下几点是我们应加以注意的：

首先，“文化”是一种精神力量。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一般意义上讲，可以把文化分为精神文化、物质文化、行为文化三种类型。物质文化是人们改造自然界以满足人类物质需要为主的那部分文化产物（如生产工具——工艺艺术文化、生态文化）；行为文化是人类处理个体与他人、个体与群体之间关系的文化产物（如礼仪制度、婚姻制度、家庭制度）；精神文化是人类文化心态和精神活动的对象化，包括人们的文化心理和社会意识等诸多形式（如政治、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宗教、哲学）。

其次，在定义“文化”概念的时候应注意的是文化本身可分为“广义的文化”和“狭义的文化”。“广义的文化”包含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而“狭义的文化”则主要是指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根据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原则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法则，应当肯定“狭义的文化”是第二性的东西，属于意识和精神的范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美国学者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指出：“保守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对于一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开明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政治可以改

^①黄文山，文化学体系 [M]，台北：中华书局，1971：89。

变文化，使文化免于沉沦。”

最后，文化有一定的社会共同性，这是不可置疑的。这种共同性是相对于人类本能的精神力量而言的。文化的社会精神力量是后天的，文化的传承是社会的传承，因此教育和学习在人类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中具有前提意义，起着巨大作用。文化的这种社会性是指文化的总体作为精神力量具有一定的社会幅度又有综合性，它并不是个体的某种精神力量。文化作为社会精神力量具有巨大而深刻的社会影响。它无论是表现为一种有约束力的氛围、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还是表现为一种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定，都有力地作用于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潜移默化，使人自然遵循，使人必然遵守，即达到“化”的作用。

总之，文化是时代精神的客观表现。正如英国诗人雪莱在《诗辨》中所说：“我们读到当代最著名的作家的作品时，对于他们字里行间所燃着的电一般的生命不能不感到震惊，这与其说是他们的精神，毋宁说是时代的精神。”文化是民族精神的客观表现。只要还有民族存在，文化就必然带有民族的传统和特色。文化是文化创造者精神世界的客观表现。鲁迅、屈原、贝多芬、雨果、巴尔扎克、凡·高等人的作品无一不打上了各自的精神烙印。

此外，文化还在诸多领域得到有力的反映：文化的核心是哲学，而其基础在教育；科学为其脊梁；文学艺术是其血肉；新闻媒体是脉络。所有这一切结成了一个整体，推动着人类前进。

1.3 中国传统文化

春秋时代，我国的政治家、思想家有一个建立“文化中国”的伟大理想。“当时他们所谓的‘中国’，既不是一个地理概念，又不是一个政治概念，也不是一个种族概念，而是一个文化的概念，即与野蛮相反的‘文明’；有所谓‘中国而失礼义则夷狄之，夷狄而能礼义则中国之’的说法。从那以后，我们的民族观念和文化观念，一直都是密切结合着的。这种将中国等同于文明观念，不免带有某些自我中心的傲慢；而将文明等同于中国，却又要求着文化上的全方位开放。按照这种观点，中国应该是文明的；而一切文明也应该使之成为中国的，不存在任何政治的、地域的和种族的歧见。汉唐盛世，便是明证。”^①

^①庞朴. 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 [M]. 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